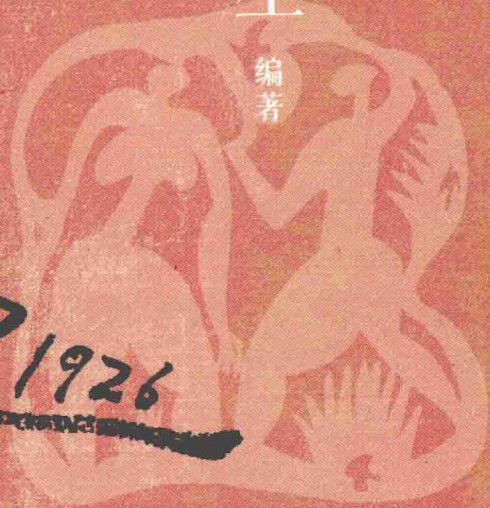


张竞生

编著

性史 1926



限

門檻也。  
未滿十八歲者  
禁止閱讀。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张竞生

编著

性史 1926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性史1926 / 张竞生编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2

ISBN 978-7-5100-6911-6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性—文化史—中国—民国 IV. ①IV.B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3 ) 第 212024 号

---

## 性史1926

---

编 著 者: 张竞生

责任编辑: 曹 文

封面设计: 大 铭

---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38355 )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1千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100-6911-6

定价: 6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

推荐序

◆  
张竞生其人其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 一、从留法哲学博士到北大教授

在20世纪初期，张竞生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十九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伏下了他后来留学法国的因缘。在那里，他还认识了孙中山。后来他去上海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据说，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一书，这是通过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来确定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女性人体特征的人类学著作。他反复阅读此书，这又伏下了他日后研究性学的因缘——最终他却为此而弄得身败名裂。人世间的祸福，实在是倚伏无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二十三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有人认为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确实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灃，事泄被捕，据说为汪精卫探监报信的就是张竞生。

不过张竞生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到法国，先入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也热心于社会活动，曾与汪精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对其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愿。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

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他推行了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类。如果说这些改革是那时新潮人物行事中应有的风格，那么，他上任伊始就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的“节制生育”——当然不被理睬，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太书生气了。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似乎也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一点端倪。

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死，再说他那套西化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去职。那时，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来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是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负。

## 二、在北京大学

当时的北京大学无疑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张竞生一到北大，就和胡适一同接待了当时欧美生育节制运动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

(Margaretsanger)之访华。此事似乎兆示着张竞生在北大的学术活动自始至终仍是与性学结有不解之缘。不久，他又积极组织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访问，但爱因斯坦中途变卦，未能成行。

张竞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计划生育，堪称先知先觉，但因“不合国情”而大受抨击。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张竞生将这些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作者极有“天才”。张竞生还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张竞生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



定则”：

- (一) 爱情是有条件的；
- (二) 爱情是可比较的；
- (三) 爱情是可以变迁的；
- (四) 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许多人士参与了对此“四项定则”的讨论，其中包括鲁迅、许广平等人。观点当然不尽一致。但是能够公开讨论爱情是何物，在当时也不失为非常解放之举了。

那时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浓厚的自由化气氛，学术研究很少禁区。比如民间的色情歌谣，就在学者们的研究之列，并且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1922年又开始发行《歌谣》周刊，其征集条例中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周作人等人对此事非常热心。而张竞生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受此自由研究氛围之影响，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俗等，当然也在应该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

育丛书第一集)。却没料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有名的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 三、《性史》风波

《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一千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的几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舸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鹄）《我的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后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这些议论多是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审美情趣和生活经验出发的，略举一段为例：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丈夫热热湿湿地

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啊！”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而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反对，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浑如篇》、《性史》等书。”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

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

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公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

与周作人当时这样的持平之论相比，其他一些人后来的态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这场风波之后十二年，阿英在抨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说中不时有些准色情内容）等人的小说时，就说：“简言之，可称为《新性史》，实由于其对于性行为的无掩蔽的写述。”《性史》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同义语。再过三年，潘光旦在蔼理斯《性心理学》译序中，将张竞生斥为“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

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还说“和这种几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是终究“忍无可忍”云云。

《性史》如何使张竞生大被恶名，还可以看张竞生后来的自述，他在自传性质的作品《十年情场》中说：“近来有些人以为我是巴黎长期的学生，习染了法国的淫风。看《性史》如猪狗的苟且，尽情地任它发泄出来。又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性史》就是现身的说法！”

张竞生被此恶名，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的教授们事先讨论过的。当《性史》第一集出版时，他已经征集到二百余篇，原准备继续出版若干续集。但他一看社会反应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阱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

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据说达十集之多。张竞生不得已，诉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书商罚款五百元并不准再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唤奈何。张竞生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澄清事实，结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为《性史》连同所有的续集都是张竞生编印的。

据张竞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费两百元，他都分发给了各个作者，自己未拿一文。书店预支给他的第二集稿费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计划时也全数退还了。那时北大的教授收入甚丰，经济非常宽裕，并不会把这点钱看得多重。然而，攻击他的人却传说他编印《性史》赚了几十万大洋。

#### 四、来到上海——“美的书店”与“第三种水”

《性史》风波，正是在1926~1927年之际。那时北大教授每任教四、五年后照例可请假出洋游学一两年（薪水照发），

张竞生已符此例，遂请假南下。到上海时，恰逢张作霖攻入北京，派刘哲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去职，蔡元培在北大的旧制多被更张。据张竞生自述，他为此决定脱离北大，就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性史》风波闹得声名狼藉，在北大存身不住才去上海的。

当时的书店往往编辑、出版、销售集于一身，“美的书店”也是如此。张竞生与友人集资两千元，在上海福州路500号开张。出资最多的友人谢蕴如就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另外请了几位临时编辑。开张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

“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有三类：

一是《性育小丛书》，这是由蔼理斯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通常每个专题约一两万字。丛书采用平装本，封面上都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又因丛书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

二是普通文艺类书籍，包括美学、宗教、艺术等。

三是浪漫派文艺和文艺丛书，如《卢梭忏悔录》、《茶花女》之类。

在此期间，张竞生又创办《新文化》月刊社，社址在今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口丰裕里94号。《新文化》创刊于1927年1月1日，封面上标举“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内有“社会建设”、“性育”、“美育”、“文艺杂记”、“批评辩论”、“杂纂”等栏目。创刊宣言中称：

到如今，我国尚脱不了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尤可惜的是连这一半文明尚是旧的、不适用的！故今要以新文化为表率，对于个人一切事情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样惊世骇俗，我们当尽量地介绍，并作一些有系统的研究。

创刊号上就展开了“妇女承继权”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知名人士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都在《赞成妇女承继权者签名书》上签名。《新文化》月刊的“批评辩论”栏也非



常吸引读者。月刊的印数曾高达两万份，成为当时少见的畅销杂志。

“美的书店”之兴旺一时，或许还与另一个经营特色有关。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学生意”还一直是男性的职业，但是“美的书店”却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

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

“美的书店”所编印各书中，在当时最引起争议的，或许就是张竞生那本《第三种水》。所谓“第三种水”，是指在性交过程中女性达到快感高潮时，从阴道中所射出的一种液体。此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家早已发现，也已经被现代的医学观察